

我读报章杂志,或看电视、听广播,常遇“扁丝”之类的词语,觉得粗俗,与粗俗相伴的,则是贫乏,如“最美……”、“最牛……”之类,千篇一律,泛滥成灾。还有所谓与时俱进的新词汇如“人艰不拆”、“喜大普奔”之类,也无意蕴和美感可言。即领导讲话、政府文告、法律判词等,“语言无味”的八股式文本亦触目皆是。

我国语言、文字何等优美、丰富,何当前语言现状如此不如人意!据我的私见,缘由或多端,大别之有三:一是割裂传统的“文革”流毒尚未泯灭,所以彼时兴盛的谩骂、粗鲁、武断、夸张的语言风习影响犹存,这且不谈。

二是对文言文的凝练、传神之美吸收太少,人们缺少传统语文能力的训练,不说诗词、古文,如对对子,从前乃儿童少年的基础修行,但早已被弃如敝屣了。虽然名胜之地尚留有不少联语,点缀江山,然能欣赏的已经极少。关于对联,曾留下无数佳话,今人更知之无多了。陈寅恪先生曾以“对对子”考察招录学生,良有以也。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人辞世,

对他最好的悼念仍是赋一挽联,挽联之可玩味,远胜冗长溢美的悼词,可惜这种良风佳俗一去不返,有学者慨叹,当代名人去世,如巴金、季羡林这样的文化巨人,竟亦不曾留下什么挽联,令人遗憾。其他文言文体的读写训练同样阙如,于是人们渐渐丧失了对文言作品的鉴赏能力,而表达上的凝练传神也无从谈起了。从前左思作《三都

## 粗俗与贫乏

尹荣方

赋》,“洛阳纸贵”。欧阳修作成《醉翁亭记》,不仅本地,即当时都城开封,人们也争相传颂。对文章之美,对美的文章,进而对其作者,满怀欣赏与尊崇之心;而“语言无味”者常被视为“面目可憎”,为人们所忌。

训练既充分,而社会对美文、美文的作者又看重,则社会用语特别是文章用语趋于雅化、精美是可以想见的了。

三是阅读的功利化,强调所谓有用,人们的兴趣多投向外语、计算机、公关、经济、金融甚至广告等实用书籍,古今优秀文、史、哲作品

日渐被疏离,我曾多年在课堂上询问学生是否读过《红楼梦》,回答读过的总共没有几人,近闻《红楼梦》被归入“死活读不下去”的名著了。不说巨著,有一次在课堂讲小品文,提到明代的张宗子,教我失望的是,绝大部分学生说没有读过他的小品,也没有听说过这位绝代散文家的名字。现当代一些真正大家的作品,也不为人所知,如张中行,竟少有人读过。现在的很多学生包括大学生,对古今一些优秀作品,不要说品味作语言之精美、内蕴之丰厚,即一般的阅读理解,也困难重重了,这是偶然的么?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古代文化构成我们的精神家园,必须得到传承。当古代文化被遗忘之时,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野蛮,就像一件东西脱离了根本,它就会毫无方向地飘荡。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今日中国社会所呈现的语言粗俗、贫乏现象,一定程度也是我们疏离(或者说不尊重)传统语言文字、传统文化所导致的吧!如果我们语言文化的精神家园日益荒芜,物质再丰饶,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也就只能是粗野、粗鄙与贫乏了。雅斯贝尔斯的警告,值得我们警醒。

## 一曲曲爱的天籁

蔡西民

——听三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在任何一版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精选集中,都会有三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它们分别是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聆听这三首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有一个共同感受,那就是它们都是一曲曲爱的天籁。

### 但愿人长久: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和第四交响曲同一时期的作品,那是他和布伦斯维克相爱的时期,爱情的滋润,让这些作品温润如玉。

音乐从定音鼓沉着、冷静,敲击心灵的若有所想的思念开始,随后由乐队奏出的主部主题,深情而大气。独奏小提琴进入之后,音乐更是越发多情而坚定。被抒情旋律主导的慢板乐章奏出天籁之声,款款温和,欣欣向荣。是一种爱的沉醉。最后乐章的回旋曲完全是一种幸福的节奏,华丽而真诚地把挚爱指向天空和永远。

贝多芬在音乐中写出他的爱情,是一种对人类的仁慈。因为他写出了爱情的本源,那就是宽容的,快乐的,和谐的情趣。

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贯通着一种生命的气韵,使得音乐的惠泽滚滚而来,源源不断。

### 此情可待成追忆: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勃拉姆斯相恋克拉拉43年,两个人就像李商隐笔下相爱的男女,表现得落落大方,又有一种相濡以沫的宽广的情怀,音乐是他们之间的灵犀。勃拉姆斯从未向克拉拉表白过

他对她的情感。但我想克拉拉是明白的,这也是因为音乐。

不管勃拉姆斯是怎样的含而不露,克拉拉始终也是波静微澜。但无论勃拉姆斯把自己的爱意隐藏得多深,“一弦一柱思年华”,他的那些不朽的旋律还是抒发他的“沧海明月”和“一寸相思”,譬如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也许是小提琴协奏曲中最抒情最优美动听的慢板乐章),极其温柔地诉说着他沧桑的情怀。

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等待,没有结果。

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仁爱与真诚啊!这一份情爱没有风花雪月的印记,也不关涉岁月春秋,因为它不受任何世间的纷扰和侵袭而一直安然存在。

## 莫道不销魂: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总是这么敏感而带着一丝忧伤和忧郁,但这并不妨碍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成为一曲爱的甘醇,这就好比明媚的春光固然容易让人沉醉在爱的喜悦之中,而帘卷西风又何尝不让人心生爱怜呢。

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协充满了情深意长,爱意绵绵的旋律,这些只属于俄罗斯,只属于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旋律。让人闻之犹怜,黯然销魂。

这一曲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真是一曲曲爱的天籁。催动着梦中的彩蝶每一下在风中的振翼,滋润着思念的青草每一记在阳光下的呼吸。是一个喜悦的灵魂对爱人倾诉时的颤栗,是仁慈的神明对浴爱之人的欣然一击。

街头涂鸦,似乎应该与声名狼藉的城市乱涂乱画划清界限的。前者属于一种街头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后者呢?则是百遭诟病的城市乱象,劣迹斑斑,人人喊打,本人也是恨之人骨,态度坚决地与城管站在一起。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的。

街头涂鸦源自西方。

## 街头涂鸦

张 跻

这种很“潮”的玩意儿多半是年轻人的游戏。他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意念或想法,宣泄对生活的态度,抒发内心最直接的情感。因此“涂鸦”画面往往铿锵激越,色彩张扬,抓人眼球。它是一座城市活力的象征。而我认为,街头涂鸦绝非街头捣乱,逮哪儿涂哪儿。首先,“下手”的地方要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其次图文也别太张牙舞爪“吓丝丝”让人难以接受。如此看来,莫干山路上的那段“涂鸦墙”倒是一个不错的景观。

每次去莫干山路50号看当代艺术展,总要走过那段色彩斑斓、图案怪异的“涂鸦墙”,运气好时,还能碰上几位洋人模样的帅哥手持喷漆,对着已涂满各种图案、毫无空隙的墙壁激情挥洒,不一会儿工夫,又一幅弹眼落睛的当街涂鸦“挤”进了画面……喷漆、覆盖,再喷涂、再覆盖,循环往复,绵延拓展,日积月累,便形成了洋洋大观、

长达数百米的“涂鸦墙”了。据说因城市改造要拆了“涂鸦墙”,为此还引发去留问题的大讨论呢!

好了,不说“涂鸦墙”的事了,说说“涂鸦”的感受吧。那可是一件放飞心情的快乐事儿!生性好动的我,年少时也曾情绪亢奋地涂过鸦的,不过那是由“官方”授权,不是忘乎所以的瞎来来。记得读中学那些年,宣传活动特别多,因此出墙报出黑板报的机会也特别多,于是学校就把搞好“宣传阵地”的重任给了我们几个能画画的学生。我们呢,自然乐此不疲,既能享受画画材料的“公费”待遇,又能在校园的走廊、围墙等“宣传阵地”尽情发挥。最得意的是:当你站在高高的凳子上,一手托着颜料盒,一手握着大号底纹笔,刷刷挥舞(那时要有喷漆会更爽),涂抹着心中的雪域高原、青山绿水。而身后有一大群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学在围观。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

近日,我又玩了一把“涂鸦”。不过那纯属老顽童的一时兴起,偶尔为之,下不为例。那是个双休日的早上,天气晴好。我被妻拽出户外活动筋骨。行至一路边超市,妻欲购置年货,嘱我门口等候,不许乱动。

闲来无事,四处张望,腿脚自然又不听使唤了,不知不觉挪到了离超市不远处的一条路口书报亭。百无聊赖地扫了一眼报刊,视线移向道路两旁。



飞瀑

(中国画)

卢金德

突然眼前一亮:几栋石库门老宅沿街而立,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焕发出勃勃生机。凝视片刻,老宅仿佛幻化成一根根速写线条,一股脑儿地滚了过来,令我怦然心动,手也随之发痒。我探身问报亭里一中年男子:“有白纸吗?”那男子也了我一眼道:“没有。”无奈,只得继续凝视。突然,眼前又一亮:有了!我惊喜地发现,在报亭左侧的橱窗玻璃上糊着一张大白纸!于是赶紧掏出画笔兴奋地在纸上画了起来。越画越投入,越画越来劲,满脑子尽是“吴冠中”“贺友直”的画风,全然无视路人的围观。很快,线条布满了白纸,报亭男子也凑了上来,他一边看一边笑眯眯地点着头,好像我是他专门请来的画师,正为他美化橱窗呢!

不知过了多久,衣角好像被谁拉了一下,转身一瞧,乖乖,妻愤怒的目光直刺过来,令人不寒而栗,连忙打住,结束了这场“涂鸦秀”。慌乱中拨开人群匆匆离去,却忘了给这幅“大作”留个影儿,多少有点遗憾是也,呵呵。

2004年1月间我在苏州,为了青春版《牡丹亭》4月到台湾作首演,天天到苏州昆剧院去看演员排练。这次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是集合两岸戏曲文化界的菁英共同打造的一项巨大工程,引起各方瞩目,因此剧组人员都很紧张,日以继夜地在磨戏。有一天,我正在排练室里盯场,院方通知我,上海电视台的曹可凡先生到苏州来,要给我做一个专访。这次访问有其历史意义,那是在中国大陆第一个电视栏目访问到我与青春版《牡丹亭》,日后我为推广青春版《牡丹亭》不知上过多少次电视节目,都是“可凡倾听”起的头。

我早就听闻“可凡倾听”是受观众欢迎的一个栏目。经过那次访问,我见识到一位名主持人的风范及特质。主持一项高水准的电视栏目而能历久不衰,常年受到观众的喜爱,真是谈何容易。首先主持人选择受访者及栏目内容必须有极高的灵敏度。曹可凡先生不辞远道而来访问我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来龙去脉,我想他早已意识到这项两岸合作的文化工程具有高度的新闻性及文化意义了。后来青春版《牡丹亭》果然变成了海内外大众所瞩目的“文化事件”,曹先生的报道拔得了头筹。在访问中,我讶异曹先生对我的背景了如指掌,我想在访问前,他对我的背景资料一定下过一番深功夫。主持人对受访者的了解程度,往往决定访问内容的高下。曹可凡

先生还有一项本事,一坐下来马上能解除受访者的心防,与受访者如同故交,侃侃而谈,把受访者的心里话很自然地引导出来。这样的访谈,才能倾听到受访者的的心声,具有一定的深度。

这些年来我跟曹可凡先生数度交往,变成了朋友,于是更了解到他成为名重一时的电视主持人绝非偶然,这个时期,两岸三地有头有脸的文化人他几乎全都访遍。2008年10月,曹可凡先生到台湾做访问,我们在台北会面,做了第二度的专访。那几天刚好从上海传来大导演谢晋突然辞世的消息,而曹先生正在做谢晋专辑,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谢晋导演身上,因为谢晋拍过我小说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他的儿子谢衍也导过改自我小说的《花桥荣记》,我跟谢晋父子都有二十年的交情,两人先后去世,令人不胜惋惜。谢晋导演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人格人品、个人魅力,更叫人怀念,我知道尤其是上海文化界对他又敬又爱。在访问中,我回忆起跟谢晋导演交往的情况,不禁伤感起来,觉得眼眶发热。我发觉这时坐在我对面的主持人,敛起了他往常的笑容,满面悲肃,眼中也在闪着泪光。我知道他跟我同时在追悼着一位文化巨人。我心中想:曹可凡也是个性情中人。

明日请看《是和棋,却很漂亮》。

## 十日谈

倾听的背后

镜头中欢愉的患者,在娜塔莎的带领下向幸福出发。每周五她就开车按订单挨家送面包,订单不断增加,内心的喜悦和成就感油然而生。他们甚至到万国公寓楼下设摊,让患者推销面包,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一批人终于在各项测试指标全部合格后回归社会,在外租住公寓,白天在面包房工作,晚上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对这一切,那些曾经被托管的人,有收入有能力有自己的生活,祥和一片,深情鞠躬表现的是一份亲情。

日子过得平常,忘记过去,憧憬明天。他们在上班的面包师制服里的白影中,还留得任浅线的尊严,简陋的得意中夹杂着淡淡的愉悦,几个回归的知己已成了生命里的不可或缺。这就是中文国际频道中的经典,“外国人在中国”一篇《面包熟了》的真实镜头,人们一下感受到心灵是那样的纯净。



马到功成 陈身道



马到成功 李乐山